

辽宁大学科研处 ● 1983年

1979—1982

辽宁大学
学术论文选编

辽 宁 大 学
学 术 论 文 选 编

中国语言文学系

(二)

(1979—1982)

辽 宁 大 学 科 研 处

一九八三年四月

前 言

自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学术年会以来，我校广大教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了进一步激励全校教师更加积极地进行科学研究，勇于著人立说，从而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为了便于交流和逐步积累科研成果，现将1979—1982年间我校教师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分系（室、所）加以选编汇编，定名《学术论文选编》。同时，对发表论文较多的教师分别编印专辑。这项工作今后将作为我校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长期继续下去。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且时间仓促，特别是对编选工作缺乏经验，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辽宁大学科研处

1983年4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选编

目 录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

——略论李大钊同志对“五四”

- 文学革命的贡献……………高擎洲 (1)
评“两个口号的论争”……………张毓茂 (16)
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来面貌……………江 潮 (34)

二、鲁迅研究

- 论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张毓茂 (39)
鲁迅和郭沫若……………张毓茂 (55)
论鲁迅的知识分子观……………杜一白 (67)
论鲁迅后期的儿童观……………杜一白 (80)
论鲁迅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杜一白 (93)
论鲁迅“五卅”前后的思想……………杜一白 (107)
论鲁迅在厦门时期的思想……………杜一白 (127)
鲁迅小说艺术谈(二则)……………杜一白 (143)
鲁迅杂文讽刺手法论略……………江 潮 (156)
鲁迅祖父的官职考订……………高擎洲 (165)

三、郭沫若研究

- 评郭沫若的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张毓茂 (168)
略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成就……………张毓茂 (182)
论郭沫若的小说……………张毓茂 (197)

谈郭沫若的《瓶》……………江超中 (243)

四、其他作家作品研究

谈周作人、林语堂五四时期的散文……………江超中 (251)

应该怎样评价老舍的《猫城记》……………陈震文 (270)

略论萧军의思想和创作……………张毓茂 (286)

“千秋功罪知无舛”

——重评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张毓茂 (310)

《暴风骤雨》人物谈……………王建中 (322)

为民族解放而呐喊

——略论罗烽的诗歌创作……………高擎洲 (332)

试谈陈毅诗词的风格……………高昆山 (363)

探求者的得与失

——张笑天创作刍议……………张毓茂 (377)

略论李云德的创作道路……………王建中 (395)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试谈曹禺历史剧

《王昭君》的真实性……………武 戈 (407)

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

——略论李大钊同志对“五四”

文学革命的贡献

高 擎 洲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思想和制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运动。

李大钊同志当时所发表的许多辉煌的政治论文、学术文章等，代表着“五四”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最高水平，起到了树立旗帜、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一)

李大钊同志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意识形态发展规律和文艺本质的先驱者。他在一九一九年写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九二〇年写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就比较系统、明确地阐述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思想。他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

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的基础构造。”文学艺术是属于“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这个范畴的，是“精神的构造”中的一部分。“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随着变动。”他在一九二三年所写的《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再次明确地说：“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完全是被动的，对经济基础没有反作用。李大钊同志指出：“人类生活的全体”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它们是“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是确认“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李大钊同志对文艺的本质所做的解释贯串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他指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文艺上也是这样。新的文艺一定要代替旧的文艺。无产阶级文艺一定要代替资产阶级文艺。李大钊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写的《新的，旧的》一文中，号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这就是说，不但旧的政治经济要改造，而且旧文学、旧思想也要革新。

文学革命包括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的改革，但首要的则是思想内容的改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战斗目标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学；总之，它是要把老教条、老八股的丑态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激

发人们的新的觉醒和奋起进行新的斗争。在我国，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孔孟之道和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三纲五常”等旧礼教，长期盘据在传统文化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之中，形成顽固的惰性力量，严重地阻碍着人民群众的觉醒。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曾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开展“复孔孟、铲伦常”的战斗。在这方面，李大钊同志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总是把“劳动的阶级”“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深刻指出：“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这个“一代哲人”的思想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二千余年，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经济上有他的基础”。由于中国经济上发生了变动，这些东西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今日中国蓬勃兴起的“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几个尊孔的信徒不论怎样倒行逆施，“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当时的复古派曾经妄图借用封建军阀的武力来镇压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李大钊痛斥他们是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并理直气壮地正告他们：“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因为那“滔滔滚滚的新潮”是“一

决不可复遏”的。李大钊同志的这些观点，有力地宣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的必然灭亡，为文学革命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对当时的新文学倡导者给予了巨大的鼓舞力量。

那么，文学上的新路径是什么？应该建设怎样的新文学呢？李大钊同志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发表在成都《星期日》杂志上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作了相当明确的回答。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文。

李大钊同志指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物，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无疑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但是，当时作为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提出改革旧文学的“八不主义”，把文字工具的改革强调为文学革命的唯一目标，大肆贩卖形式改良主义，则是有背于文学革命的基本精神的。正如鲁迅所说：“腐败的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无声的中国》）。李大钊同志的这个话，显然是反对胡适的形式主义的唯白话论的。但是，李大钊同志所强调的文学内容的彻底革命，并不是指“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浮面上装饰一番。因为，正如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所指出，当时社会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得很，“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连“安福派的社会主义”也“跟着发现”。一小撮封建军阀、政客组成的安福系，竟然也以“社会主义”相标榜。所以李大钊同志明确指出，不要被那一连串的“新”字眼所迷惑，要分辨出哪是“杂草毒草”，哪是“善良的谷物花草”。

他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而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结合李大钊同志其他一些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所说的“坚信的主义”，当然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同志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一直强调“谈主义”，自称“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并且坚决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在文艺上，他要求作家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又具有精湛的艺术修养，才能使作品饱含“宏深的思想、学理”。文艺来源于生活，以真实性为基础，因此，李大钊同志在强调要有正确思想作指导的同时，又明确提出“社会写实”的问题，这就是说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实，能够为“创造一种新生活”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作祟，使“五四”时代的新文学存在着许多不良的倾向和缺点，对此，李大钊同志是很不满意的，因而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一般新文学存在的缺点，“概括说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具体分析起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不过拾了点新知事物，用白话写出来”，缺乏“宏深的思想、学理”；二是“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把文学当作“为个人造名”的工具，谋私利的“一种广告”；三是“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的心理的斑点”，充满了“刻薄、狂傲、狭隘、跨躁”的思想情绪。李大钊同志认为，这些东西是违背我们对新文学作品的要求的，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新思潮、新文艺的“中干”，又适足以成为“挑起反动的引子”，因此，他大声疾呼：“此是今日文学界、思想界

莫大的危机”。在这里，李大钊同志实际上是指出了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文艺的大问题，他已经敏锐地看出了资产阶级思想对文艺的严重危害性。

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博爱的精神”，应该怎样理解呢？从历史上看，“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李大钊同志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曾提倡过这些东西。但是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同志成为共产主义者，他所说的“博爱”，绝不是要离开阶级去“爱一切人”。“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封建的口号，是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的。但是，就其本质来说则是虚伪的，资产阶级从未曾实行过；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调和论。李大钊同志因为接受了共产主义，所以他这时强调新文学要有“博爱精神”，就具有了新的内涵，其意思和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发出的“人道的钟声响了”的欢呼是一致的，就是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为清除反动势力，解放劳动人民而斗争。李大钊同志本人就是与剥削统治阶级势不两立、热爱人民、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在他的好多篇文章里都曾谈到，超阶级的“博爱”是不存在的。他说，在黑暗社会里，从前“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但是，由于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改造，“使他永远不能实现”。他认为，只有通过“最后的阶级斗争”这个手段，“改造社会泯灭阶级”，才能把人类引向“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理想境界。他把在列宁领导下“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的兴起，归因于俄罗斯“人道主义之精神”的深入人心。由这些可以看出，尽管“博爱”之类的提法不够科学，但在解释上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出发点的；如果可以把这些观点称作人道主义的话，那也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或革命的人道主义。

李大钊同志还写有《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

义》等文，提倡文学上的“平民主义”。他说：“现代有一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遍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就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平民主义’。”文学应当反映时代精神，这“平民主义”就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所以，“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被传播于现今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

什么是“平民主义”呢？“平民主义”本是民主主义的另一译法。但李大钊同志对“平民主义”的解释，已经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了本质的区别，他指的是社会主义。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前夕就是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文学上，当时陈独秀曾提出过“国民文学”，周作人曾提出过“平民文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这里所谓“国民”和“平民”，都是指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范畴。李大钊同志提出的“平民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它为平民政治开“一新纪元”。他说：“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所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工人政治”，就是“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统治。”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工人政治就变为“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没有阶级统治了。他认为，“工人政治”“才是纯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可见，李大钊同志所说的文学上的“平民主义”，就是要使文学接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以工农劳动群众为主体，表现他们，歌颂他们，为他们服务；就是要在文学作品中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思想，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五四”时代，新文学阵营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抱有“个性解放”的思想，这种思想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又有不利于革命的消极的一面。而资产阶级右翼胡适之流，又以歪曲易卜生的手段，大肆宣扬文艺上的“唯我主义”，妄图把新文学拉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李大钊同志说的“平民主义”，实际上接触到了为什么人的问题，这对胡适之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为广大的新文学倡导者指明了逐步摆脱个人主义、努力向集体主义迈进的正确方向。

(二)

李大钊同志有广博深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而且是卓有成就的学者、诗人、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是他的新文学理论和主张的生动体现，尖锐有力地鞭笞了黑暗社会和反动势力，抒发了坚决扫荡旧事物、誓把中国“回春再造”的凌云壮志，洋溢着革命激情。

李大钊同志的遗诗，现存二十五首。其中，大部分是旧体诗，共十九首，都是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期所写，在《言治》杂志上发表过一部分。这些诗，早已脍炙人口，誉满文坛。至于他的新诗，虽然仅有六首，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在“正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新诗是打先锋的。李大钊同志是最早尝试新诗写作的诗人之一，他从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就开始发表新诗。这些新诗，有充实的内容，自由活泼的形式，刚健清新的风格，和谐谨严的韵律，其引人注目的成就，显示了诗人的高尚情操和艺术才华；它们对“五四”新诗歌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昌黎五峰山是李大钊同志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他曾经有两次到那里去避难。他有几首白话诗就是在五峰山写的。《山中即景》是一首清新、轻快的风景诗。短小精悍，寓意深远。诗云：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

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这首诗，是自然美的歌颂，又是诗人品格和气质的自我写照，诗人是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层峦幽谷，千般景色；清彻的流泉，奏出绝妙的音乐；这些，在诗人的胸怀激发起由衷的欢愉和喜爱，促使他努力讴歌祖国大自然的美。诗中“白云”和“青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寓意。笼罩山峰的“白云”终归要飞走，巍巍“青山”依然挺立；诗人坚定乐观的高尚情操，通过形象的描写得到充分的表现。李大钊同志写这首诗的时候，反动军阀政府正竭力恫吓和镇压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正身陷图圉，作者自己正避难五峰山；特别是新文化阵营发生了破裂，他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正是这个时候发生的。联系这个时代背景，便可清楚地理解此诗的深刻寓意和战斗精神。

表现同样思想内容的风景诗，还有《山峰》和《山中落雨》。短诗《山峰》再一次歌颂了坚韧、挺拔的形象，

一个山峰头，

长着几颗松树。

片片的白云，

有时把它遮住。

白云飞来便去，

山峰依然露出。

诗中通过一幅生动的大自然的画面，烘托出富有革命意义的思想和信念：云遮雾罩只是暂时的。劲松不会因它而枯萎，高山不会因它而倾倒，当“白云”远离时，“松树”、“山峰”会“依然露出”。在这里，大自然被人格化了，诗人实际上是在借自然景物，抒发自己的革命胸怀，歌颂对真理的忠贞不渝的高尚品格。

鲁迅曾经分析过“五四”以后新文化阵营发生分化的形势：“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李大钊同志的《山中落雨》一诗，正是这种社会现状的形象化的再现。在黑暗统治的浓雾包围下，有些人徬徨不知所向，有些人热情消失，“忽然来了一阵烟雨，把四山团团围住”，有些人又“迷了归路”。诗人描绘了那些不坚定者的种种表现，对他们显然是非常不满的。而他自己，则把这一切置之度外，坚定不移地向着光明的道路走去。

一九一九年写作的《岭上的羊》，表现了更为鲜明的政治倾向，抒发了对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深切的同情。诗中的“山羊”实是暗指备受欺凌的我中华民族和劳动人民。他们爬山越岭，茹苦含辛，在他们的“声音”里，“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含着战栗”。诗人指出他们的悲惨的命运：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

天天只傍着那山水，

吃些草叶和草子；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近百年来的我中华民族，工农劳动大众，不正是这样的吗？他们善良，勤劳，他们供出自己的一切，所得到的只是穷

困，苦难。他们忍饥受寒，告苦无门。诗的结尾写道：“我不但不怕你，并且怜你。我不怕你，并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诗人把贴心的同情献给他们。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诗人向着“岭上的羊”的队伍里走去，这是人民的“胜利”；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岭上的羊”的光明前途一定会到来。在这里，诗中暗含着诗人要为他们献身的愿望和乐观主义的信念。

如果说上面的几首诗，主要是借景抒情，着重于烘托、隐喻，那么，《欢迎独秀出狱》一诗则是直抒胸襟，礼赞革命。这首诗，可以说是李大钊同志个人的革命精神的再现。在诗人看来，反动派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监狱”和“死”都不能使革命者“屈膝”。革命者因为“拥护真理”，所以不怕牺牲，无所畏惧。真理是永远打不碎、扑不灭的，相反，它倒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者即使个人牺牲了，会有千百万革命者继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这诗是李大钊同志的遗诗中思想性很强的一首，表现了一个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革命的钢铁意志和必胜信念。被歌颂的对象陈独秀当时是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激流之中的，但后来却逸出革命阵线之外，而李大钊同志则以生命保卫了革命真理，其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霄壤之别。

李大钊同志还写过不少散文和政论杂感，大都发表在《每周评论》、《新生活》等刊物上。这些文章都带有相当的文艺性，而且充满了革命激情，战斗性极强。事实上，即使他的一些学术论文也不乏富有文艺性的片断和诗人的热情。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的结尾说：“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

运之鹄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这虽是一段文言文，但并不生涩；特别是广泛地使用比喻，说理透辟而具体，感情浓烈，的确是文采飞扬的好文章。

李大钊同志的散文、杂感，都是由现实而发，为战斗而写。就内容而言，鞭笞反动派、揭露旧社会的最多。在《牢狱的生活》一文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的世界和中国，人民过的是“牢狱的生活”，“象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在另一篇文中，全部用形象化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所谓“中日亲善”的实质，乃是“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人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对于军阀政客的横行无忌和广大人民在旧社会之毫无地位，他是痛心疾首的。“主和客是待的名词，既有政客，必有政主。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混一口饭吃，看不见主人的影儿。请问这种客吃的饭是那个款待他们的，共和国的政主到底是谁？”（《政客》）在中国，反动派所搞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宰猪场式的政治》）作者